

强军要论

进入新时代,备战打仗既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和迫切呼唤,也是强军兴军的中心任务和鲜明指向,是全军的主责主业和第一要务

始终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

■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

习主席反复强调,全军要始终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3月12日,习主席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再次强调,全军要聚力备战打仗,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这些重要指示,既是殷殷期望,更是统帅号令,深刻揭示了强国强军对备战打仗的时代要求,指明了全军的主责主业和重心在战的鲜明导向,为扎实推进备战打仗、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提供了根本遵循。

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是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

备战打仗是军队的根本职能和价值所系。进入新时代,备战打仗既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和迫切呼唤,也是强军兴军的中心任务和鲜明指向,是全军的主责主业和第一要务。我们需要从政治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入把握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的重要作用和紧迫性。

抓好“两个第一要务”、夯实民族复兴基石的迫切需要。第一要务,就是最首位、最根本、最重要的事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强调富国和强军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石,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习主席反复强调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后,又于2018年8月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强调军队要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于2019年1月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中要求“始终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深刻揭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富国和强军的内在联系。当前,夯实民族复兴的基石,要求我军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归正工作重心,抓好第一要务以锻造一流战斗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扭住“强军之要”、破除和平积弊的关键举措。“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当今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军事实力在大国博弈中的地位作用更加突出。各大国无不加大强军力度,谋求国际军事优势。我军既面对紧跟世界军事发展潮流,加快推进强军事业的严峻挑战,又面临承平日久容易滋生和平积弊等突出问题。习主席反复强调,军队是一个战斗队,必须时刻绷紧备战打仗这根弦,对和平积弊来个“大起底、大扫除”。全军部队只有狠抓第一要务,才能牢牢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彻底铲除和平积弊,加快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有效慑敌制敌、应对安全挑战的现实课题。“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我军素以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著称于世,反对“国强必霸”、以强凌弱,但保卫国家安全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不能没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大国战略竞争更加激烈,我国地缘战略环境日趋复杂。个别西方国家把我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加大战略遏制力度。我国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是安全的高风险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务繁重。全军只有把备战打仗作为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紧紧抓好,才能有效应对各战略方向和重大安全领域现实威胁,做到慑有效果、谈有砝码、打有胜算,确保一旦有事能快速有效应对。

不断强化抓好第一要务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能力

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不断强化备战打仗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能力,使部队一切建设和工作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真正把备战打仗指挥棒立起来,把抓备战打仗的责任担当起来。

审时度势绷紧备战打仗之弦。“善战者,求之于势。”立起备战打仗指挥棒,必须全面把握世之大势、国之大势、军之大势,特别是把握世界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新变化,把握军队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新特点,把握信息化战争、智能化战争演变新趋势,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要按照习主席关于“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要求,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保持临战姿态,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抓打仗的准备。

直击要害解答统帅“胜战之问”。习主席围绕备战打仗提出一系列“胜战之问”,诸如“和平积弊”“畏敌怯战”问题,“两个差距很大”“两个能力不够”“五个不会”问题,“四风”“腐败”问题等

等,无不是关系强军胜战的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有效推进第一要务,必须深刻体悟习主席的忧患关切和决心意图,对突出短板弱项扭住不放、持续用力,不遮不掩查摆问题,深挖细究找准症结,拉单对账研究对策,把统帅的“胜战之问”变为“克敌之策”“胜战之能”。

聚焦实战强化作战需求牵引。“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习主席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作战需求牵引备战打仗的制胜规律。旧质战斗力打赢不了新时代的战争。当前,信息化战争加速演变,智能化战争初见端倪,战争形态不断向信息化深度演进和智能化快速发展。推进新时代备战打仗,必须坚持以作战需求为根本牵引,始终瞄准明天的战争,对接未来战场需求,深刻洞悉新的战争制胜机理,切实用更新更勇敢的头脑筹划今天的战场、设计明天的战争、制胜未来的战场。

瞄准一流提升备战打仗层次。一流军队是民族复兴的支撑,一流战斗力是一流军队的标配。新时代备战打仗必须着眼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以理念转变促进备战打仗层次提升:一是由建战脱节向抓建为战、以战领建转变,彻底根治重建轻战、建战脱节倾向,坚决纠正一切同实战要求不符的思想和行为;二是由被动适应战争向主动设计战争转变,加强核心作战概念和作战理论开发,创新作战方式和军事力量运用方式,掌控未来战争主动权;三是由以打促建向抓建为战、以战领建转变,彻底根治重建轻战、建战脱节倾向,坚决纠正一切同实战要求不符的思想和行为;三是由以打促建向抓建为战、以战领建转变,彻底根治重建轻战、建战脱节倾向,坚决纠正一切同实战要求不符的思想和行为。

确立结合锻造过硬战斗作风。抓好备战打仗这个第一要务,最终看落实,关键靠作风。一些同志淡忘打仗的使命、荒废备战的主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风不严不实。推进备战打仗必须做好破和立两篇文章:一方面,要以整风精神深入纠治和平积弊,并反思问题背后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以不打仗的心态作打仗的准备、以打仗的名义做与打仗无关的事情突出问题;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尚武练武精武的战斗文化,引导官兵强化真打实备战斗信念、敢打必胜战斗血性、英勇顽强战斗作风,强化谋战备战胜战的政治自觉,切实使备战打仗成为党委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理论纵横

习主席深刻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变,这是铁律,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其深刻性复杂性格外引人关注。“大变局”的内涵绝非单一的,而是丰富的、多维度的。以下是“大变局”的几个观察点:

政治格局之变。国际政治格局决定了世界的基本面貌。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东升西降”趋势。一方面,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另一方面,国际权力越来越分散,世界多极化进程正在向纵深推进。当然,世界秩序的重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还处于量变积累中。有识之士坦言,现在需要谋划的问题不是美国霸权是否衰落,而是怎样衰落,战略家们不要因为美国的衰落而给他国和世界带来危险甚至灾难。

经济格局之变。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金砖国家”由概念变成现实,世界经济版图正在重构。如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全球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引擎。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反应相近似,世界经济格局之变也加深了某些西方国家的危机感,美国极力分化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更多运用“制裁”、极限施压等经济手段,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安全格局之变。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也要看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都更加丰富,时空领域更加宽广,各种因素更加错综复杂。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安全,都面临着一些新课题新挑战。我们既要重视外部安全又要重视内部安全,既要重视国土安全又要重视国民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既要重视自身安全又要重视共同安全。

文化格局之变。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人、财、物、智的跨国流动成为常态,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展现,其所带来的冲击是相当巨大的。信息化、网络化的普及,既给人们借鉴和吸收人类优秀

从「大变局」视角看世界

董国政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其深刻性复杂性格外引人关注

文化成果提供了捷径,又给各种不良文化的渗透提供了土壤。世人既能感受到各国人民在互联互通中逐渐萌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须防范排外主义、极端主义等思潮流行所产生的影响和危害。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急切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理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分析国际形势演变规律,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并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用典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释义:2019年4月15日,习主席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中引用,出自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意思是文章应当为时代而写就,诗歌应当为现实而创作。

(徐欢、王卓辑)



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把种种国家权益抵押给外国人,又总是借新债还旧债,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社会状态中不能自拔

旧中国军队为何靠借外债打仗

徐焰

清廷又各借外债几千万两,偿还都很困难。后来签《马关条约》对日本的2亿两赔款全靠借新债,再加上1901年后向八国联军支付庚子赔款,这些钱就由海关关税抵押。中国海关就出现了由外国人收税的咄咄怪事,总税务司之职竟让美国人赫德担任了45年。

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任总统后,政府军政开支中自筹部分仅能有六成,为此于翌年向西方五国财团达成2500万英镑(折合2.4亿美元)的“善后大借款”,因此时已无海关而以国内最大的收入盐税抵押。靠这些钱,北洋军阀能迅速打败南方革命党,不过当时明眼人都看出抵押盐税后政府的收入会更少,将来用什么还债?这岂不是饮鸩止渴!袁世凯死后,主持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同日本达成“西原大借款”1.4亿日元,用来打内战,并以东北的“满蒙四路”铁路权和当地金矿、森林做抵押。

蒋介石在广州黄埔建军直至北伐期间,重要军费来源是求助苏联,到达长江流域后又依靠以英美为靠山的江浙财团筹款。国民党不敢得罪列强,承认清政府所欠外债和赔款将继续偿还,加上内战不息,财政总是入不敷出。至1936年即所谓国民党自吹的“黄金十年”鼎盛期,南京政府财政支

出不过11.8亿元,其六成用于军费。蒋介石对嫡系部队士兵每月能发饷7至8元,配给德国钢盔并发胶鞋。杂牌军士兵每月只能发饷2至4元,如川军士兵大都不发鞋而靠自己打草鞋,行军没有水壶而每人带一竹筒。如此苦乐不均,自然导致各部很难协同作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军费一半是靠靠英美贷款和海外捐款解决,其中最大部分又是太平洋战争期间得到自官同意租借的8亿多美元。此后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又向美国借款几十亿美元,为此于1946年11月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中美商务》,规定中国全境让美国舰、机任意进入并可自由倾销商品,就此成为山姆大叔的附庸,直至逃台后仍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时就不惧他人威胁的无畏气概,不承认过去卖国政府的一切外债。解放初期,军队因费用不足,向苏联借过折合1.3亿美元的武器款,却都属“信用借贷”(没有抵押全凭友好信任),后来不仅如约甚至主动提前归还。中国自此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还贷信誉,有利于后来引进外资,而解放前那种债台高筑受制于外人的惨状也就此一去不复返。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如果思想之舵出现偏差,就会导致党的事业受到影响

党员干部要把稳思想之舵

陈思

建设的意见》,坚持不懈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

把稳思想之舵,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习主席视理想信念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许多优秀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把稳思想之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良好的人格操守至关重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主席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强化党内政治生活、开展集中专题教育、加强各级党校培训、落实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加大巡视和反腐败力度等,使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积极变化。军队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和古田全军政工会议精神,党员干部的思想面貌也焕然一新,确保了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顺利推进和部队战斗力的提升。但是,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对理想信念淡化、思想道德滑坡、担当奋斗精神不够。时代是变化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要使党员干部把稳思想之舵不偏航,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

都同党同心同德。

把稳思想之舵,必须牢记根本宗旨。习主席强调,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和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员干部要时刻站稳政治立场,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时刻牢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要想一想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不是有利于解决群众的难题,是不是有利于增进人民的福祉。

把稳思想之舵,必须涵养人品官德。“美好的思想,如果没有美好的品德来陪伴,它也只不过是泡影。”党员干部要懂得为政之道、修身之本,把品德修养作为终身任务。要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坚守精神高地,看淡个人进退得失,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做到慎独慎微。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任何时候都要稳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研究中心)

读史札记

从清末到民国年间,中国,因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和腐败政权的盘剥,导致人口第一大国的财政收入不及欧洲一些弹丸小国,政府遇事常向列强借款。列强放债利息甚高,且都属“抵押借贷”,要以关税、路权和矿藏开发权作为担保。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把种种国家权益抵押给外国人,又总是借新债还旧债,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社会状态中不能自拔。

1851年之前,清朝年财政收入只有可怜的4000多万两白银,不足英国的十分之一。此后太平军席卷富庶之地,清政府财政锐减却又扩编新军,只好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自己筹饷建军。1868年左宗棠率8万湘军西征,平定陕甘后于1875年进军收复新疆。此时西北极为穷困,清廷让东南各省“协饷”820万两而仅送到160万两,左宗棠只好向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商人借款1595万两,首开借外债打仗的先例。因西征胜利后国内有一段安定环境,这些借款还能由东南各省按期本利归还。1884年中法战争发生和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后,